

说说“限行”与“路权”

纪玉

今日论语

交通拥堵,空气污染,面对这些与汽车有关的城市病,国内已有多个城市采取包括“限外”在内的限行措施。对于限行措施,赞同者、反对者都有。2月5日,深圳交警向262辆违反“限外令”的外地牌照车辆开出罚单,再次引发讨论。

实际上,一样是反对,理由也未必相同——有人认为限行并不能真正缓解拥堵等问题;有人认为限行措施可行,但一些地方在程序上存在瑕疵;有人则认为限行措施本身就侵犯了公民的权利,比如路权。

什么是“路权”?广义上说,应该是指人们使用道路的权利,包括行

人、非机动车、机动车。由于限行措施的主要对象是小汽车,如果把“限行”和“路权”放在一起,就是说小汽车的行驶权利受到了限制。

可以达成共识的是,城市道路是公共资源,其增长受到公共财政和土地资源的限制,不可能满足所有需求。当需求超过供给,供给增长有限时,抑制需求就成为一个选项,其中就包括对道路通行权利进行重新配置甚至限制。在道路资源有限的城市,权利配置方式应该向那些有利于提高道路使用率的交通方式倾斜,比如公共交通;小汽车平均占有的道路资源远远超过行人、非机动车和公共交通工具,在必要时受到限制,是情理之中的。

所谓“路权”,因为关系到公共资

源的分享方式,并不是“不可侵犯”的。如果人人都只强调“权利”而不接受任何限制,那么造成交通拥堵、空气质量恶化,损失的就不仅仅是自己的权益,更是侵犯了他人的权益。

当然,限行措施虽有其合理性,但不代表地方政府就可以“任性”推行。首先,限行是否必要,需要认真研判。如果在城市规划、交通基础设施、交通管理手段等方面没有优化升级,仅指望限行措施的“立竿见影”,很难真正解决拥堵问题。

其次,限行能否达到预期效果,需要有长远和综合考量的眼光。比如针对某一车型的限行措施,可能使需求转移,导致替代车型的销量增长,结果并没有成功抑制总体需求。又如“限外”,据新华社报道,区

域交通中心城市“限外”,很可能造成区域交通梗阻,影响区域发展。

第三,限行在程序上有没有瑕疵,不能含糊过去。现在的限行措施,往往是政府部门一声令下就立即执行,公众只能接受,这实际上是无视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。即便限行有必要,也要考虑并尽可能减少小汽车拥有者的损失,并在推行之前得到公众的认可。不能重管理而轻服务,而要把公众看作推行行政措施的合作者而非干扰者。此外,推行限行措施要注重公平,不能只限私家车而不限公务用车。

总之,限行措施是一个“迫不得已”的办法。车辆通行要遵守规则,不能“想跑就跑”,推行限行措施也应谨慎、通盘考虑,不能“想限就限”。

新民随笔

范志毅,加油!

晏秋秋

2月1日,范志毅的老克勒明星队搞年会,席开五桌。我去得晚,范志毅特地在他身边留出座位。见了面,他就来了一个大大的拥抱,随后悄悄地说:“我又要回申花了。明天签约,周四去基地。”我由衷地感到高兴。这么多年了,范志毅终于重回申花。那一天,范志毅的女儿范斯晶也来了。我这个叔叔看了,不敢相认,妞妞出落成小姑娘了。是啊,时间过得真快……

1995年,范志毅叱咤风云,成为上海滩的头号体育偶像“范大将军”时,我还在备战高考。刚入行时,在老师的带领下,采访范志毅,印象最深的是范妈妈说:“这个孩子,口袋里只有5角,还要问我讨2分。问他为什么,他说有4个小朋友,小馄饨1角3一碗……”

2002年世界杯,采访最多的就是范志毅。约好时间,他在宾馆大堂咖啡吧一坐,时不时招呼进出的熟人。咖啡经常从两个人喝到七八个人,最后范志毅大手一挥:买单!

在英国踢球,范志毅的家成了宾馆。来来往往,熟人不断。我去看他,范志毅开车到火车站来接,给我演示那时还罕见的车载GPS。在家中,他亲自下厨,做几道菜。洗青菜时,范志毅突然说:“这里除了踢球,都不习惯。这个青菜要5镑一斤……”

退役后,范志毅做过许多事情。但坦率地说,都没有当年风光。范志毅绝非完人,不过,在他出现打人等负面新闻时,我至少不像别人一样,上纲上线,一通臭骂。因为我清楚,范志毅是一个很单纯甚至有些天真的人。当周边环境适合的时候,他就横空出世,成为城市英雄。但随着年龄大了,周边环境又改变时,范志毅就不适应了……

如今,申花把范志毅重新请回去,这个举动很得人心。这么多年了,许多人写过《小范成熟了》或《阿毅成熟了》这样的文章,我想,其实范志毅并没有变。他这样的脾气,这样的血性,只有在足球场上,才能焕发自我。

范志毅,加油!

新民新语

好老师,考出来?

曹刚

假设你是高三教师,校领导以业务练兵为由,要求你和学生坐在一间教室里参加模拟考,你作何反应?前不久,徐州一所中学40岁以下高三教师就遇到了这个问题。有些老师觉得“伤自尊了”,交白卷抗议,还有人因此受到停课处分。

校领导出此规定,实在不聪明。业务练兵的方式很多,却选了性价比这么低的——既会引起老师反感,又不能真正体现教学水平,瞎折腾。部分老师也不冷静,端着“师道尊严”的架子不肯放,可交白卷无异于让自己的权威和面子“雪上加霜”。

按理说,老师不应该怕考试,都是身经百战考过来的。考分输给部分学生,也很正常,想当年,报考师范的他们,在班里也不一定是领头羊。

考不过学生,照样能当好老师。穆里尼奥屡创足坛神话,只是专业翻译出身;刘翔恩师孙海平,又拿过几块跨栏金牌?道理很简单,偏有人不明白,想出练兵的馊主意。兵没练好,气倒练出不少。

对中青年教师的类似要求,上海一些中学也有,区别在于:改闭卷考为家庭作业,老师可带回家做题,考分不纳入评价体系,更容易让人接受。

为啥没年龄线,不对所有教师一视同仁?因为年轻人缺经验,更需锻炼,同时可塑性强,更有潜力。老教师的水平基本定型,且经过了多届学生的实践检验。区别对待,对老同志既是信任,也是照顾。

判断一个好老师,靠师生同考不行。老师考得好,不等于教得好;学生考得好,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老师的水平。因为看似简单粗暴的考分背后,涉及教师的很多素质,比如亲和力,能激发学习兴趣;表达能力,能讲透思路、说清方法;沟通能力,能了解学生心理,和他们打成一片……至于考试能力,只是教师综合素质中的一小块拼图。

老师好不好,应当由学生说了算。怎么说?一看学生的客观成绩,二参考学生对老师的主观评价。事实上,受学生欢迎的老师,往往也更善于提高学生成绩。何必师生同考,多此一举。

官员财产公开需要制度引领

日报观点

日前卸任广州市政协副主席的范松青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,他2013年率先公开财产之后,一些本来很亲密友好的同事慢慢对他敬而远之,甚至盯梢防范。妻子儿女等家里人也经常埋怨他,让他感到“有形无形的压力”。

这种“廉政从我做起”的态度和做法应该得到赞誉。然而,这名官员在现实生活中遭遇的却是冷遇和疏远。可见,十八大以来不断加强的反

腐败工作虽然取得了巨大成果,但一些地方、一些部门的反腐倡廉整体氛围,仍然不能过分乐观。

推行官员财产公开是反腐败的利器,也是反腐败从治标到治本的重要制度安排。在没有制度安排的情况下,主动公开财产者容易成为“另类的少数派”。面对这样的“少数派”,人们的心理和反应往往复杂微妙。

好制度使坏人不能办坏事,更能使好人理直气壮地站在进步的立场上,更有效果地多做好事。在官员公开财产的意愿和公开财产的行动之间,就是需要制度建设发挥作用的

地带。财产公开说起来简单,只是轻飘飘一句话,但真正的实施,却涉及到一系列的制度建设和法治建设。

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巨大成果,也极大鼓舞了人民群众的必胜信心,扭转了社会心态对于反腐形势的认知和预期。顺势而为推进包括财产公开在内的反腐倡廉制度建设,不但能巩固目前已经取得的阶段性成果,还能为进一步扩大战果,直至最终取得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胜利,提供坚实的制度和组织保障。(封寿炎 刊今日解放日报 本报有删节)



奢侈年假

「工作能力周周比,任务指标月月逼。考评审核年年过,回头看年假已过期?」新年将至,各单位考评忙碌。回首过去,没有休过年假的人,既感叹又无奈。据统计,二〇一四年,只有百分之四十一的人休完了年假。 孺子牛画

网视舆情

移动互联网为公益活动提供了便利,年关将近,有一些群体总会在这个节点进入人们的视线,成为公益关怀的对象。比如环卫工人,有人最近在互联网上发起环卫工心愿卡活动,环卫工举着写有“年轻人,少放点鞭炮!让我老伴早回家过年!谢谢体谅!”字样的心愿卡,倡议大家少放鞭炮。这一活动很快以“少放鞭炮早回家”为话题在朋友圈和微博走红,不少明星、大V都表示支持,不过,很快也出现争议,一些网友发起各种版本的“早回家过年”话题。在一张“鞭炮大爷”的图片中,卖鞭炮的大爷也举着心愿卡:“请大家多买点可怜老人卖的鞭炮,让他有钱不会被儿女抛弃。”也有网友倡议“少看春晚,让主持人早点回家过年”,原本颇具公益

被玩坏的心愿卡公益活动

何小手

意味的活动很快就被玩坏了。

网友对这样一个活动的娱乐化态度,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活动本身的价值。与此相关的严肃讨论也出现分歧,新京报刊登了两种近乎对立的观点,焦点在于活动本身是否有道德施压的成分,一种观点认为,这种鸡汤式的劝善只是煽情而非说理,结果“激发人心怜悯,能将问题导向道德化求解,却未必能解决问题”;与此对应的一种观点则认为,这只是一种温馨提醒式的提醒,动辄将正常的道德感召说成“绑架”,是道德虚无主义作祟,至于这种方式则值得商榷,活动本身“是对文明呼吁的选项之一,也许并非最完美的表达。”新闻学者则关注

这一活动的炒作成分,关注它是不是一个新闻策划,中山大学校区传播与设计学院讲师、中山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执行院长周如南认为:“如果剔除所有新闻恶意,那么是可以理解的,因为作为一个个体事件,它传达出的一种价值,即人们对于弱者的同情和关怀,这个是值得肯定的。”

从公益实现的角度看,纯粹对个体关怀难以促成普遍的自觉行动,理性的人反复提醒,环卫工可以不可以早回家过年,与放不放鞭炮没有任何关系。但试图凭借怜悯弱者来以情动人,这就是很多网络公益活动的共性,实践证明,它的传播范围与说服效果显然比纯粹说理更

广。网络公益活动更多依靠情感动员,这既是它们成功的关键,也是理性人嗤之以鼻的原因。不同的角度会导致截然相反的评价,焦点在于公益行动到底要起到何种效果,是给关怀对象以实质的利益,还是仅仅吸引人,承担观念启蒙的角色。网络公益经常被斥为炒作,因为很多时候公益行动广泛传播以后,关怀对象被忽视,组织者倒是逐渐为人所知,公益活动成为他们的代表作。这决定了活动的营销特质,久而久之行动形象就偏向负面。网络公益也要讲究规范,尤其要立足扎实的线下行动,理想的状况应该是双赢,公益人和关怀对象都有所得。